

第一章 使英初期

1941年7月—1942年10月

第一节 任职伊始

(1) 受命使英

1941年春外交部来电称政府拟调我至伦敦接替郭泰祺任驻英大使。不久，郭本人也通知我说，他已将此事告知英国政府征求同意。他说这是在和当时的英国外交次官，英国外交部第二号人物巴特勒先生谈话时口头提出的。巴特勒说，他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并且说他和我有个人交往，同意我出任驻英大使一事不成问题；不过，必须按例行手续办事，由外交部呈请英王批准。

接获外交部电报后，我立即着手准备离开维希。虽说我国政府要我尽快前往伦敦，但我决定还是先去葡萄牙一行。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交通运输问题。另外，尽管我预料同意任命一事不致有什么问题，但觉得还是等取得正式同意以后再去伦敦为好。

从维希到里斯本是经陆路乘汽车去的，费时两天。路上夜宿停留两次，一次在马德里，另一次在马德里和葡萄牙边境之间的小镇。到达葡萄牙后，我在里斯本小住了几天，然后搬到里斯本城外的伊什图里尔。这里是海滨游览胜地。我去那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想呆在首都，因为我在那里出现会引起种种猜测，使自己暴露于记者们的围攻之下；二是当时看来，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英国政府才会答复。英国政府似乎想多了解一些造成

中国政府这次人事更迭(外长王宠惠辞职,由郭泰祺接任)的内情。相对地说,郭在中国外交界资历较浅,地位不高,出使英国还是他初次担任驻外职务。

一直到4月份(?)才收到了英国政府的答复。答复当然是赞同的,但拖延了如此之久,说明我当初决定留在里斯本等待,而没有匆忙前往伦敦是完全得当的。一等两个多月,真是度日如年,又何况战火连天,益加困难重重。我住在葡萄牙,也使葡萄牙政府感到为难。许多使团团长和我都有私交,我曾受到几位大使的社交性接待,这使我颇感尴尬,因为我遥遥无期地在葡萄牙呆着,使人莫明其妙。(那时中国驻里斯本的公使是李锦纶博士,1931年我任南京政府外长时,他任次长。)

我想方设法向郭泰祺探听消息,并查明此中原委。郭说他正在全力催办。郭曾就我出任驻英大使一事同英方会谈两次,但事后的发展情况却使我大惑不解。郭无法解释英方为什么迟迟不做答复。经他催促,巴特勒对他说,稽延的原因在于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的建议。寇尔来电建议说,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最好有一位国民党高级人士作为代表驻在伦敦(我于次年才成为国民党党员),英国外交部内部显然在为此交换意见。英国外交部虽然正在考虑寇尔的意见,但也感到他的意见未免有些来得蹊跷。他们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此项任命,因为早在二十年前,我就任中国驻伦敦公使,因而英国政府中许多要员都认得我。(虽说在外交上一国政府拒绝某一使节的任命并非必须说明理由,但通常都作出一些解释。)经郭再三催促,巴特勒说,他们正在等候驻华大使的回复,以便听取他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混淆不清。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弄不懂重庆那个寇尔爵士所持这种见解的真实意向。当时我请郭详细说明伦敦那里的情况,他说,迄今他还没有向英方递交过按常规应

有的书面通知，而只是口头转达这一请求。我想这也许就给英国政府造成了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迟迟不予回复。

与此同时，郭泰祺接到命令，要他速返重庆接任外交部长，特别是政府已准其所请返渝时取道美国，以便同美国国务卿和其他美国官员接触。这一着不失为高明之举，不过要多费些时日。

英国政府对我的任命表示同意是在郭离英前夕还是离英之后现在我已记不清了，似乎是在他离英之后。在那段时间里，我从重庆方面得悉，使问题复杂化的真正原因是某前教育部长十分热衷于去伦敦当大使。他是留英学生，又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国民党员。自从1938年寇尔抵渝后，此公便煞费苦心同这位英国大使培植友谊，两人终于结为密友。这位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去看大使，向他提供我政府内部的各种情况。每当寇尔想打听些中国政府的事情时，他就去找这位中国朋友。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位英国大使把我撇在一边而全力支持此公前往伦敦的宿愿。中国政府认为此次对我的选任是恰当无比的，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表同意，这使我国政府深感诧异而恼火。其后找出了问题的真实原因，就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一局面，接着英国政府就作出了答复。不过派遣新大使虽然必须取得驻在国的认可，而人选主要还是应由派遣大使的国家决定的。寇尔居然在别国派遣大使的人选问题上插了一手，这种情况确实有些离奇。中国政府找到了英国迟迟不作答复的真实原因后，对那位前教育部长深为不满，并向寇尔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愤慨，从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问题。政府收到了英国表示同意的答复，便正式发表了任命我为驻英大使的决定，并敦促我立即离里斯本赴伦敦上任。

这时我呆在里斯本已近三个月了。直到7月上旬，我才作

好动身前往伦敦的一切准备。本来我想在里斯本再呆些日子，以便同我国政府就中英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当时英国有个以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首的委员会，正要为联合和平运动召开群众大会，他们非常热诚地邀我专程到会讲演。这个运动属于国际性质，法国就有个同样的组织，叫做国际和平大联盟，在许多盟国中设有分支机构。英国方面由塞西尔、诺埃尔·贝克和政治、教育、实业界许多知名人士主持。很多著名的工党人士在政治上都支持这个运动。我于7月1日去英国，大会大约是7月7日召开的。

(2)使英总目标

中国外交部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外交部不同，新大使或新公使上任时并不一定给予一系列的指示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据我所知，后来对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都给予正式的训令，扼要地说明委派他谈判和讨论的主要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这种做法已成常规。）我这次奉派使英就没有接到正式训令，也许因为我的资历较深，与部内人员，或是驻外使节相比，我在外交界差不多比谁的资格都老。事情明摆着，在那个非常时期，派往伦敦的任何一位中国大使都必须处理某些具体的问题，因此事实上也无须训令。我国抗战已有四年，要继续打下去，虽然还不是面临绝境，但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而战，因此不仅理应获得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应该得到各种贷款、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等实际援助。我们必须寻求上述各种形式的具体援助。换句话说，应当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于自由世界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这样，各友好国家的政府方能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和西方世界的自由事业是

利害与共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就会以较好的态度执行援华政策，尤其重要的是使其立法机关有很好的理解，因为援华政策的执行，必须有这些立法机关的支持，并经其批准。我怀着这两项明确的目标，即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寻求物质上的援助，开始在伦敦执行我的大使任务。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我随即着手组织宣传工作。我经常接受各方邀请，在官方或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目的是向他们说明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我还动员了一部分当时在英国而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中国人一起来做，其中有教师、艺术家、银行家和使领馆中英语说得比较流利的人们。中国报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当然也包括在内。还包括许多高等学校的留学生。我列出了一些问题和要点，供他们公开发表言论时加以强调。其全部宗旨就是促使英国公众和一切爱好自由的西方人士普遍了解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形成一种协调一致的说法，使公众认清中国的抗战同西方民主国家反侵略战争的密切关系，从而防止公众认识上混乱不清。当时英国正在同轴心国特别是纳粹分子作殊死战，伦敦是西欧武装抵抗轴心国的中心；苏俄则刚刚参战，是东欧抗德战场的前哨。

我到伦敦就职后，很快就意识到我的职责不应局限于同英国处好关系，争取他们了解我们。我意识到，使流亡到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盟国政府了解中国的抗战，也是我的重要任务。那时中国派有外交代表的西方盟国，除了几个大国而外，还有挪威、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已迁至英国，我国派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随着把他们的使馆转移到了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所在地。这些使团汇集到伦敦，倒给了我经常同他们商讨问题以共同为中国的抗战大业出力的好机会。实际上派驻这些流亡政府的许多中国代表，都是

我过去的老同事或合作者。为了推动我使命中两大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亦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大业，我同他们一起工作，不但相处得很好，而且感到甚为愉快。

关于这方面的活动，以及英国对中国和对待亚洲各国奋战的态度演变，下面还要详谈。这里首先扼要地讨论一下在我使英期间特别是任职之初，中英关系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节 五大问题

(1) 英国的战争贷款

使英期间我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战争贷款问题。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中两国不仅是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两国也宣战了，因此中、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国家的同盟国。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作为在争取民主事业的伟大斗争中美国同中国共同合作的象征。事实上，芦沟桥事变以后，在美国，同情中国抗战的浪潮十分高涨，舆论纷纷要求国会和罗斯福政府尽量帮助中国。当时也有一批颇有影响的孤立主义者和和平论者，主张美国对欧战采取中立政策。但对中国的财政援助已经以棉花贷款和桐油贷款的形式源源而来。自从美、中在这场共同的武装斗争中结为盟邦后，那帮孤立主义者和和平论者也就不那么喧嚣了，加以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抗战一向都很同情，因此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终于办成了这笔五亿美元的援助。

中国和美国要求英国同样对中国作出同情和友好的表示。不久，英国政府宣布打算向中国提供五千万英镑援款。下面是1942年2月2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的有关英国这一决定的消息：

“下午8时20分，艾登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内阁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给中国……五千万英镑贷款，并以租借形式拨给军火和军用设备。他并说，英国这一决定系由于美国在华盛顿宣布了援华的决定而促成的，因此两三小时内即将宣布。”

这一决定是同华盛顿协商的结果。显然罗斯福总统运用了他对邱吉尔的影响，使邱吉尔不仅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而且要在美国宣布五亿美元贷款的同时予以宣布。这就是艾登所说将在两三小时内宣布的缘由。

“艾登并称已给英国驻重庆大使去电；这是因为艾登希望委员长在消息见报前先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此事……我说我当立即电告重庆。”

这一公告成了此后多次谈判的主题。它引起了中、英两国间的不少误会和争议。我去伦敦时的愿望之一，便是希望英国能向中国提供一些财政援助。由于当时英国只卷入了欧战，它同日本还保持着友好关系，因而这个想法看来不大可能实现。珍珠港事件以后，英日间的形势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缅甸，使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2年初英国宣布援华五千万英镑一事，不仅是友好合作的表示，而且还另有其宣传意义。它可以向美国人表明：对于中国的抗战，英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此外它还表明，英国效忠于自由国家的反侵略事业。

英国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独立生存，正在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这就要求它把一点一滴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资源都用于自己的作战。不过，这种情况中国人并不完全理解。在中国政府和委员长本人看来，这一宣布表明了英国当真准备给中国提供上述财政援助。也许英国的声明仅仅是一种姿态，不过当然

它没有这样明说。执行此项声明的谈判开始了，主要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中国政府一心一意地认为英国将成为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另一来源。这笔援助纵然没有美援数字那样大，也还抵得上美国贷款的一半。中国方面切望这一诺言很快就能兑现。

我向外交大臣提出这一问题时，艾登对我说明了英国本身财政的拮据状况。他说英国本身也有赖于美国提供一部分财政援助。这我是知道的。英国在纽约借了几笔战时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的军火武器。此外，英国一直在纽约市场上抛售它所拥有的外国证券换取现款，因为根据当时的美国法律，一切都要“现金交易”。即便把英国所有的海外财源，全部用于支付各项需要，也还很吃力。英国历来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眼下由于外贸额缩小，因而经济状况益趋恶化。中欧传统市场不用说是关闭了，德国潜艇还在破坏英国同其他地区的贸易。

英国经济拮据的状况，重庆方面是不大理解的，我就设法向他们解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英国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对此负责。这一态度使艾登感到有些狼狈。在实际协商时，我逐渐明白所谓贷款，只不过是一个姿态，其用意是进行宣传和增强中国人的士气，并没有真正实施的打算。重庆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因此大为不满。当然，这种不满在中国方面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以前，英国对远东的态度和行动，就已经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英国的政策总是把英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不直接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总是避免得罪强国，那怕这个强国是侵略者。

我想起了1938年在华北发生的一桩事件。那时日本人通过“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1935年7月)已经在华北牢牢站稳了脚跟，正在当地不断扩大日本势力，目的在使华北脱离中国政

府。对此,美国奉行的是不承认政策,态度十分坚决。这种政策是美国自从日本人在满洲进行扩张活动和1931年的沈阳事变以来,就已执行的。但是英国采取的却是对日本一味迁就的政策,而不是坚决支持中国。到了1938年,英国竟然声明承认华北的日本政权为事实上的政权。这一声明不仅使中国政府,而且使全中国人民大为失望和不满。

当时我在巴黎,感到必须发表一项谴责英国的声明。我指出英国这样做是犯了错误,因为尽管英国承认的仅仅是华北的日本政权,但是此举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其后果只能是助长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在内的侵略势力。这项声明是由《世界合作报》发表的,它的发行范围极广,遍及全世界。我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可以自由发表中国感到失望以至忿懣的意见。我甚至在没有取得我国政府同意之前就发表了那篇文章。我感到在这类问题是决不会有反对意见的。对诸如此类我认为不可能有分歧意见的问题,我惯于主动行事。即使有什么反应,也只能是反对我个人,我国政府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这样的声明最好是由驻英国大使来发表,不过我想郭泰祺是由于他在那里所面临的处境而感到不好办。他作为中国驻英大使,感到不能发表意见。事后不久,我便知道英国当局对我那篇在世界各地刊出的文章果然感到不满,英国外交部还公开向郭表示了不满。尽管如此,该文在英国公众中却颇受欢迎。

我提这件事,目的是在说明英国的对华政策即使不是表里不一,也是含含糊糊,暧昧不清的。事实上我在巴黎的时候,我接到过很多报告说,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就向法、英两国交涉,意在言外地进行威胁,要求英法撤出所有驻华军队,并不得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有一份报告说,英国正在间接同日本举行会谈,目的在制止日本和欧洲的轴心国家结成

一伙，他们打算付出的代价是让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自由行动。这一情报是通过在巴黎的几个消息来源获得的。

法国那时也在不断同英国进行磋商，而且在收买日本这个问题上，态度同英国一致。实际上法日已经在巴黎开始了秘密谈判，不过不是通过日本使馆，而是通过三菱株式会社和南满铁路的首脑们进行的。他们同法国财界领袖经过初步谈判，作了如下安排，即日本尊重法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则答应撤出在华驻军，并且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这是1939年欧战爆发后的事。在此以前，法国一贯持谨慎的政策，英国则素来奉行他们所谓的“现实”政策，也就是不采取任何使日本感到不悦的步骤，害怕日本跑到轴心国一边去。

以上就是中国对英国远东政策的看法。再加上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还有租界、租借地和领事裁判权等等，其所以有这种看法就更易理解了。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老百姓都认为，中国要摆脱外国侵略，争得自由，不能指望英、法等国来发善心，做好事。当外国人侵略中国时，除了美国，其它大国一般只是在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才出面干涉。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英、法能分得一份赃物，它们便会欣然站在侵略者一边。这就是中国政界为什么以上述心理状态看待英国的历史背景。

因此，一旦英国作出了给予财政援助的许诺，中国就坚持毫不让步，要它负责。不幸得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重庆就是要求兑现，当然中国是完全有权这样要求的。双方的观点我都了解，因此感到很为难，为此就商于美国大使怀南特。怀南特是同情中国抗战的伟大朋友，与我个人也有私交。他完全同意我对英国所持态度的看法，认为我最好同艾登面谈一番。我说我理解艾登的处境；重庆对此事的激烈情绪使我深感不安。

实际上我已同艾登会谈过好几次。他说歉难履行诺言。对此，我完全理解。英国显然想帮助中国，但是力不从心。因此在这类问题上发表一项声明，无非是表明英国愿意站在美国一边。在远东，英国只把中国视为它帝国主义全球政策中的一环。实行英美友好，则是当时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所在。

艾登说，即使英国马上提供五千万英镑，中国也无法充分加以利用。因为大家知道这笔贷款是用来采购英国货物的。当时欧战方酣，中国所需要的许多物资，英国根本无法供应。因此他认为贷款的数目应减为一千万英镑。对这种削减，重庆不能同意。我设法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艾登说的数目增加到二千五百万英镑。即使这样，我完全理解我们也不能全部利用。因为艾登明白表示过，这笔钱是作为信贷用的。中国需要哪些东西，英国能够提供哪些东西，都需研究和调查。英国说不定会对中国说，你所需要的，恕我拿不出来。这是个实际问题。

至于怀南特的建议，我倒十分同意。他告诉我，艾登刚刚离开伦敦去乡间的别墅。应我之请，他表示愿意和艾登通个电话，以便安排一次会见。过后，艾登打电话给我，邀我到他乡间的家中共进午餐，面谈一切。时间大概是1942年5月30日，那是星期六。我当然同意。艾登和我都理解，这是一次私下交谈。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除了在他家作客的次官理查德·劳先生，再加艾登夫人外，别无他人。我们在一起午餐。他真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我记得就餐时他要我坐在他的右边，他的夫人则在左边。席间他不时起身斟酒。他的男管家应征入伍了，家里没有任何佣人。我对英国人的民主精神印象很深。

午餐过后，他同我开始会谈。我向他说了我的难处，并且说我已尽了一切努力让重庆理解英国的处境。他说他不断收到驻重庆大使的报告，说委员长和中国政府对英国深为不满，使他

感到难堪。对于这一情况，他说他并不感到吃惊。因此他很喜欢我去当面谈谈。我提起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数字时，我说就在我看来，双方都有些骑虎难下，我们必须设法使双方不失体面地下台阶。他同意了，并说他相信能够取得财政大臣和首相同意提供一笔信贷。其次就是在英国可能获得的东西也许微乎其微。这是个技术问题，应由专家们在一起商定一个采购清单。但首先必须就提供贷款的数额达成谅解。可是，在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又要先审查一下采购单，以便双方确切知道到底能获得多少物资。

这样一来，事情就拖下来了，这是由于要等重庆约请双方专家拟定采购计划。这个问题直到1944年5月2日签订协议书时才得到处理。五千万英镑数字未动，但对使用这笔信贷的办法作了详细规定。

(2) 滇缅公路

第二个问题是滇缅公路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棘手，特别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快。

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后，自由中国实际上已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况。物资和军火的输入，最初依赖印度支那这条孔道，一切物品都要用汽车或火车从海防港经陆路运至中国内地；但是法国很担心这样会冒犯日本，因此一再关闭这条通道。多亏了两位殖民部长（先是莫泰，后为孟戴尔）的同情，肯于出面帮忙。他们都很友好，但是经常要和内阁中的反对派特别是军事当局进行斗争。因为后者一向同情日本，反对援华，担心惹怒日本，从而危害到法国的利益。这样，由铁路陆运物资的办法实际上行不通了，因为日本的谍报网遍及各处，很容易被他们侦察出来。所以，由海防港运往云南的物资主要是用汽车运输的。法国当局

还不时要封锁交通，扣押物资，借以向日本表明他们是在禁运。当然，有些物品是空运入境的，主要是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但数量有限。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更为关注了。罗斯福总统看到必须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要使中国能够继续对日作战，就必须建立一条通往重庆和中国西部的可靠通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办法就是开辟滇缅公路。要实现这个计划，十分需要取得英国的通力合作，因为那时缅甸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遗憾的是，英国的政策摇摆不定。由于美国施加了压力，英国同意了这个方案，但等到实际执行之时，却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政治方面的不多，主要是技术问题。英国人说，首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好这条路；第二，在这种山区修路，要耗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说，时间需要好几年，而且即使修好了，也是靠不住的，因为雨季一到，全部公路就会冲垮。他们还列表说明，即使按最大运量计算，这条公路的运输能力也远远不足以维持中国抗战的需要。

中、美、英三国代表在华盛顿为此进行了多次商讨。委员长迫切希望中国能得到全力支援，以便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认为修建滇缅公路是绝对必要的，并且希望能尽快修好。美国当局、特别是军事当局，对此完全赞同。英国则不断以技术困难、时间因素和费用等为理由加以反对。显然，他们这种论调事实上是有其政治背景的。英国认为欧战对整个世界来说居于头等重要地位，因此应集中力量打败欧洲的轴心国家，然后才能倾全力于远东，同美国一起，共同对付日本。

最后，在中国的推动下，美国作出了一项决定：由美国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借以配合中国的劳力。结果证明，筑路之举绝非不可能，实际完工时间比预计的要短。1942年我回国时走过滇

緬公路，看到國內那段公路已經修好。1943年全線竣工。

滇緬公路的建成，是很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美國的支持。從此，大宗作戰物資經由這條公路源源運進中國。公路沿線都有加油站（總站在加爾各答）。由於有了這條公路，才能修建許多飛機場。如在印度阿薩姆邦的汀江，很快就修建好一個飛機場，這個機場不是用混凝土鋪設的，而只是把土地推平後鋪上了一層鋼絲網。

然而，修建滇緬公路問題在中、英兩國間造成了很大的誤解。公路通過美國的技术和財政援助，終於修成了。但是它卻使中國對英國留下了長期的不滿和不信任感。

（3）香港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香港問題。中國無時不在想着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復失地。委員長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同樣懷有这样的夙願。羅斯福總統的態度也鼓勵了中國，他不止一次表明，他完全贊同委員長關於收復失地的願望。羅斯福本人還曾敦促過邱吉爾把香港歸還給中國。曾經隨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議的王寵惠博士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就敦促過邱吉爾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並且說，那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國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廣州。邱吉爾憤然回復說，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國解体。這表明邱吉爾對香港的感情有多么強烈。這種情緒英國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中國人則認為毫無道理。

我到倫敦任職不久便接到訓令，要我研究并試探英國對香港問題的態度。訓令不是直接要我進行談判，只是指出香港是中國政府渴望儘快解決的問題之一。我本人認為，這是我在倫敦應作為重點加以注意的問題之一。於是我便擬定了一個計劃，

要摸清英国各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向艾登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向邱吉尔提过。不过在这之前，我首先试探了一些其他人的看法，其中有议会领袖，报业发行人，银行界巨头（尤其是象汇丰银行的老板们那样的银行家，他们的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商业巨子，中国协会（该组织很有势力，对英国制定政策往往有很大影响），大学界（如万灵学院院长，即后来的古德一金尼斯皮尔勋爵，其子曾赴北京，公然替共产党说话，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此外，至少还有四、五位剑桥的教授）以及社交界领袖蒙巴顿夫人等。

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就英国人对香港问题的看法获得一个综合的概念。通过好几个月持续努力收集得来的情况，我才得到一幅清晰的图像，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政府、金融巨头集团和普通老百姓——打算把香港全部归还给中国，不过人人都认为当前应先解决当务之急，香港问题最好留到战争胜利后去解决。我发现英国人都能正确理解中国收回香港的愿望，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他们公开对我说，香港理应归还中国，有的说它是中国的领土，居民都是中国人；有的说中国战后将成为强国，香港是中国的国防前哨，对中国有用，而英国要防守香港，终归是个问题。甚至邱吉尔本人有时候也流露出上述看法来，这我以后还要提到。一些议员也直率地说，香港应当归还中国；对英国来说，它是个负担，难于防守。从商业上说，香港是个前哨基地，对英国很重要。但把它交回中国，中国将成为对英友好的国家；香港在中国手里，对英国的商业同样可以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英国既懂得从政治上说香港必须归还中国，也明白英国这样做不致有多大损失，而且英国还有所得，就是可以赢得中国的友谊和好感。

我跟邱吉尔长谈过几次。他说他不反对归还香港，不过日